

卡扎菲“绿色革命”的内涵及其命运

宋 静¹ 高原²

(1. 上海市普陀行政学院, 上海 200065; 2. 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院, 广东 珠海 519087)

摘 要:在卡扎菲的领导下,利比亚在上世纪 70 年代发起的“卡扎菲绿色革命”,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的思想被编织到具有利比亚革命意识形态的《绿皮书》之中。但卡扎菲只是利用其绿色革命来树立权威和输出他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由于卡扎菲合法性受到正统伊斯兰世界的质疑与伊斯兰运动的挑战,其针对西方国家的极端主义的革命输出更使他陷入孤立的境地,“卡扎菲绿色革命”的历史命运注定要寿终正寝。

关键词:卡扎菲;绿色革命《绿皮书》;利比亚;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1-0069-05

一 “卡扎菲绿色革命”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上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高潮时期,利比亚领导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埃及纳赛尔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1969 年,他上台执政后立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利比亚”的目标。之后,两个事件深深影响着利比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1959 年利比亚在大漠深处发现石油后,这个有一百万居民、经济上一直依赖英美的北非穷国,在十年间一跃成为该地区居于领导地位的石油生产大国。在卡扎菲领导下,利比亚掀起了“卡式绿色革命”。“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这三种互相联系、相互区别的思想被放到了利比亚革命意识形态当中。

“伊斯兰曾经是并仍将是利比亚社会的基本

粘合剂。作为忠诚和认同的基本单位,宗教在控制和动员群众方面历来是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的一种政治象征。”^[1]卡扎菲对伊斯兰教的诉求,受到他个人的宗教虔诚及其国家所处地理位置与社会政治的现实性影响。卡扎菲以伊斯兰力量来增强他在利比亚进行军事政变和社会革命的合法性,同时也在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广泛传播了他的影响。^[2]卡扎菲把他的新政府置身于“一条从伊斯兰教出发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上,一种源自真正的伊斯兰的宗教和崇高的圣书的社会主义。”^[3]以此,他合法化地废黜了利比亚的伊德里斯国王君主制。

20 世纪 70 年代下半叶,卡扎菲公布了他一生中重大的政治构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绿皮书》。这一书名经过精心构造,使人很容易联想

收稿日期:2011-08-31

作者简介:宋静(1973-),男,山西太原人,上海市普陀行政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方向:外交、国际政治研究;高原(1979-),女,山西绛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到伊斯兰的宗教主张。穆斯林们相信,《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和引导穆斯林社会生存和进步的源泉。在阿拉伯世界中,绿色常常与先知穆罕默德相联系,因此,《绿皮书》可以界定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替代和第三世界的光明大道。可见,卡扎菲理想中的世界秩序是以“《绿皮书》这一人类解放的指南。绿皮书是新福音,大众时代的福音。”^[4]

卡扎菲宣教的“世界新福音”是他早期版本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模式的精神扩展,这种社会主义明显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和亚洲广泛流行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宗教基础之上的“第三条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既是阿拉伯的又是伊斯兰的。我们既站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中间,又站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中途上。我们的社会主义直接来源于阿拉伯世界的要求,来源于它的文化遗产和社会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正义,这种社会正义意味着充分的社会产品和公正的国民分配。”^[5]

卡扎菲建立了一个所谓“大众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众国。”1977年3月,这种新利比亚的民众特性和意识形态被制度化,总人民代表大会取代了卡扎菲执政初期的革命指挥委员会,他还将在利比亚的国名“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改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为此,他放弃了名义上的总统职务,专心成为革命哲学家和意识形态专家,开始着手开展了一场利比亚世界的社会绿色革命。不过,这场革命并非以《古兰经》的原始教义为基础,而是以反对崇拜偶像的卡扎菲革命思想为基础,将当时利比亚民众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实验融合在一起。

在经济领域,根据《绿皮书》,卡扎菲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废除土地私人所有制、废除工资和租金、鼓励工人参与生产资料管理的新模式。1978年,这一“新社会主义”实践正式开始。利比亚人被限定只能拥有一所房屋,以解决多年来的居民住房危机,私人零售商业被彻底废

除,卡扎菲还鼓励工人抢占自己的工厂,在利比亚全国公共公司实行自我管理方案,那些具有充满革命精神的利比亚工人一夜之间竟然成为国营经济的“合伙人”。^{[6]22}

二 革命实质:“被修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

卡扎菲一方面引进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一方面重新肯定了利比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用强大的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来支撑他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穆斯林信仰融为一体。在利比亚,昔日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留下来的殖民主义元素被一个个剔除,全部西方教堂遭到关闭,基督教传教活动被勒令禁止,英美的军事基地也被卡扎菲没收;阿拉伯语重新回到了官方语言的位置;阿拉伯的名字和街头上的标记代替了西方的名字和标记。利比亚严令禁止酒精销售、夜总会和赌博,并建立了伊斯兰宣教会,从而在国内和北非地区传播伊斯兰教。

尽管西方传媒认定利比亚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并把卡扎菲所做的种种事情全部贴上伊斯兰的标签,包括伊斯兰法律、人体炸弹、恐怖主义等等,然而更多的穆斯林民众不断地被卡扎菲所激怒。因为,卡扎菲要求伊斯兰教服从他的政治理念和革命意识形态。他只是利用伊斯兰教来输出他在穆斯林世界的个人影响,使他的激进的民众国家合法化,不容忍任何替代性的伊斯兰的声音和观点,也不在乎穆斯林世界对他那些非伊斯兰教正统教义的声讨。在利比亚,界定伊斯兰教的权威是卡扎菲,而不是普遍认为的伊斯兰学者(乌里玛)。他甚至把乌里玛称为“利比亚的反动分子”,拒绝他们作为伊斯兰教权威的正统角色,并寻求改变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解释。

可以说,利比亚的绿色革命是一场“纠正伊斯兰教的革命”,为的是“正确地解释伊斯兰,净化伊斯兰的反动实践,即那些穿着非伊斯兰的、倒退服装的实践。”^[7]卡扎菲通过保留所有有知识穆斯林对伊斯兰教解释的权利,这为他重新解释伊斯兰教提供了合法的地位。他创造了西方

和穆斯林世界批评者所认为的激进的伊斯兰革命,拒绝伊斯兰的历史传统,目的就是为利比亚的民众国家和他的世界第三理论提供革命实践的支持。

与伊斯兰传统观念不同的是,卡扎菲的利比亚不是一个仅仅“从字面上回归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卡扎菲心目中的伊斯兰是高度革新和重新整合的,这在许多正统穆斯林看来,完全是一种激进的、近乎异端的“卡式修正主义”。卡扎菲对伊斯兰教的诠释涉及到伊斯兰教法——沙里亚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传统上,公认的伊斯兰国家的标准是穆斯林统治者必须公开承认沙里亚。而卡扎菲根本没有把伊斯兰教法放在眼里,他用浪漫的革命主义思想《绿皮书》代替了沙里亚中传统的、包容一切的社会信条。

卡扎菲还大胆地否定了古兰经中许多圣训的真实性和约束力,并改变了穆斯林教历的起始日期,提出到麦加朝觐并非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完纳天课(即什一税)就是参加社会保险。不同于传统做法的是,卡扎菲认为天课不是固定税(2.5%),而是可变的。^[8]

卡扎菲对伊斯兰宗教权威的剥夺以及他对伊斯兰教的任意篡改,使他走上了一条与整个穆斯林世界宗教领袖们相背离的道路。那些受到宗教压制的权威者不满卡扎菲对他们政治利益的篡夺以及他对伊斯兰教教义的重新诠释。伊斯兰学者们谴责卡扎菲标新立异的诠释完全是对传统的离经叛教。卡扎菲以“宗教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专家的身份”来证明他的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以“人民权威的名义和伊斯兰社会正义来拒绝传统”。人民民众委员会“受到指示‘去夺取清真寺’,使它们摆脱‘崇拜偶像的旧思想’和那些被指为在万恶过去‘散播居心叵测捏造的异端故事来歪曲伊斯兰宗教的伊玛目们(宗教领袖)。”^[2]¹⁴³

不管怎样,他把《古兰经》和《绿皮书》立为利比亚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绿皮书》是源于《古兰经》而高于《古兰经》的神圣经典。事实

上,《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被限定在私人生活领域(遵守诸如礼拜、斋戒、天课等宗教礼仪制度),管理和指导利比亚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则是“伟大的《绿皮书》”。

三 利比亚政权与伊斯兰运动的关系

在伊斯兰世界,卡扎菲统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受到了包括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解放组织运动的挑战。利比亚被视为在一个有组织的、持不同宗教信仰的、极端危险的异端国家,一个企图利用伊斯兰教来增强其合法性统治的强权派,面临着来自伊斯兰宗教权力机构内部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外部伊斯兰运动反对派的攻击。虽然那些伊斯兰运动主义者们也对伊斯兰宗教既定权力机构表示出不满,但更把卡扎菲视为世俗势力中的机会主义者,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利益歪曲了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反过来,卡扎菲也把穆斯林兄弟会看作是对他的民众、社会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目标和组织上的威胁,“是反社会主义的、泛伊斯兰的和等级森严的非法组织”。那些成长于约旦、突尼斯、埃及的伊斯兰解放组织,已经渗透到利比亚的军队之中,并在1983年和1984年的政变图谋之中展示出力量,因此,关于伊斯兰反对派的秘密报告在80年代至90年代一直没有中断,卡扎菲在1987年坚决处决了那些“好战的圣战组织和真主党”成员们。无独有偶,1989年,穆斯林的学生运动也有所展开,为数更多的伊斯兰女性在校园内围着盖头,首都的黎波里的法塔赫大学发生了被卡扎菲当局认为是“穆斯林兄弟会策动的学生示威”,利比亚的清真寺里重新恢复了对世俗政治的革命性讨论。1989年秋季,更有相当数量的伊斯兰好斗分子们与利比亚治安部队展开警民对峙的流血冲突现象。有观察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利比亚的伊斯兰运动完全可以构成最明确的和具有最强大的潜在力量的大众反对派。”^[6]⁸⁰而在卡扎菲眼里,他们不过是“癌瘤”、“黑色死亡”和“爱滋病”。

像沙特阿拉伯一样,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把对伊斯兰世界团结的诉求同石油财富相结合,来促进它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作用。因此,伊斯兰教就成为利比亚输出“卡式绿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工具。当然,伊斯兰教并非利比亚对外政策的唯一手段,而是与阿拉伯主义、非洲主义和第三世界主义相捆绑的综合。因此,卡扎菲的实用主义和他的政治癖好、对西方的恐怖行为等被西方传媒和美国大大放大。

四 革命输出:针对西方国家的极端主义

卡扎菲的英雄冒险主义产生于他心目中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和被承认为整个非洲和第三世界领袖的愿望。他的普世主义充满了好斗的精神,其早期革命灵感来自他对伊斯兰教的自我诠释,它的扩张主义普遍性与全世界人类解放的理想有关联。卡扎菲效仿埃及老大哥纳赛尔和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的榜样,把布教活动和革命宣传相结合。他激进的政治理念来源于一种反西方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西方特别是美国妖魔化,指控“穆斯林世界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落后是欧美几百年旧殖民主义和以色列新殖民主义造成的。”不过,卡扎菲并没有同苏联和东欧结盟,因为他拒绝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及其价值观。

就卡扎菲而言,在一个由西方主宰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和第三世界解放的意识形态诉求达到自己的目标,即惩罚报应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9]卡扎菲开始资助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反欧美的政府、伊斯兰组织和极端组织,包括对西方人进行绑架、爆炸和谋杀的恐怖活动。卡扎菲还号召整个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毁灭以色列,甚至主张推翻沙特阿拉伯国王的正统以及后来背叛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埃及。他支持或被别人宣称支持过诸如乌干达统治者阿明、中非的博卡萨暴君以及菲、泰的穆斯林解放运动,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的伊

斯兰极端主义运动、激进的巴勒斯坦团体和困扰英国多年的爱尔兰共和军。

1967年以后,利比亚对外政策发生巨大变化,利用伊斯兰宣教会作为基本组织来促进它在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活动。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于1972年建立了宣教会,在国际上重新对伊斯兰特性界定和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作为利比亚大外交的主要渠道。利比亚通过在非洲的大众传媒传播、出版宗教刊物、传教活动、援建清真寺、提供医疗社会福利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提高其国际形象。冈比亚前外交官员在回忆利比亚在非洲的影响时,评价到“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未从利比亚得到过某种财政援助,利比亚援建的一座座清真寺的确带来了‘绿色福音。’”

利比亚还将外交与伊斯兰宣教会活动相结合,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与沙特阿拉伯展开竞争,利用其手中的石油财富来扩大它从穆斯林学生团体到解放组织中的影响,不但为他们的领导人提供避难所,还为宗教活动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给予军事和外交的双重支持。^[10]

由于利比亚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和刑事惩罚,并不断对西方发起恐怖主义活动,利比亚被认定为一个“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国家”。所以,不论是爱尔兰共和军、巴勒斯坦组织,还是毛主义者,还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驱使,只要它反对西方,只要它激进暴力,就同利比亚相联系。阿拉伯许多国家也经常把本国出现的反对派运动归因于利比亚是始作俑者。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的以及美国 and 欧洲的国家政府已经对利比亚的外部干涉和暴力感到厌倦,利比亚作为一个释放和怂恿极端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名声已经成为牢固的思维定势。对整个西方而言,卡扎菲已经成为世界范围恐怖主义的代言人,其危险性如同“地狱中邪恶的撒旦”。包括利比亚外交活动的主要地区——非洲许多国家政府也不再欢迎利比亚及其伊斯兰宣教会的存在。利比亚的经济援助外交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团结。相反,在他们的眼里,利比亚对

好战的伊斯兰行动主义者和革命团体的政治支持构成对现有政府安全的威胁,远远压倒了它的援助意义。因此,在当前的“倒卡运动”中,大部分国家包括非洲受援国都放弃了对卡扎菲政权的同情,其思想根源恐怕与“卡扎菲绿色革命”的传播不无干系。

参考文献:

- [1]里里安·克雷格·哈里斯. 卡扎菲的革命与现代国家[M]. 纽约: 西方观点出版社, 1986: 31.
- [2]莉萨·安德森. 卡扎菲的伊斯兰[M]//复兴伊斯兰之呐喊.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3.
- [3]领导人话语中的利比亚革命[J]. 中东杂志, 1970(24): 208.
- [4]奥里安纳·法拉西. 伊朗人是我们的兄弟: 与利比亚卡扎菲上校的会见[N]. 纽约时报, 1979-12-16.
- [5]阿尤布. 卡扎菲的伊斯兰[M]//复兴伊斯兰之呐喊.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3: 94.
- [6]迪克·范德瓦里. 卡扎菲的未完成的革命[J]. 地中海(季刊), 1990: 72.
- [7]莉萨·安德森. 突尼斯和利比亚对伊斯兰冲动的回应[M]//伊朗革命的全球影响. 佛罗里达: 国际大学出版社, 1990: 171.
- [8]乔治·乔菲. 利比亚的伊斯兰反对派[J]. 第三世界(季刊), 1984: 624.
- [9]B. S. 阿莫里蒂. 利比亚在面对世界中的孤独[M]// 对外政策中的伊斯兰.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3: 55.
- [10]诺扬. 利比亚对外政策中的伊斯兰因素[J]. 非洲与世界, 1987(1-2): 20.

(责任编辑:李 莉)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Gaddafi's “Green Revolution” and Its Destiny

NING Jing¹, GAO Yuan²

- (1. Putuo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065, China;
2. Zhuhai Colleg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7,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addafi, a “Green Revolution” with Gaddafi’s thought was launched in Libya in the 1970s by weaving into *The Green Book*—a book with Libyan revolutionary ideology—three interrelated but distinct ideas of Pan-Arabism, Socialism and Islam. Howev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just manipulated by Gaddafi to establish his authority and to spread his influence in the Islamic world. As his legitimacy has been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by the Islamic orthodoxy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Gaddafi has been plunged into isolation because of his revolutionary export of extremism directed at western countries, and his “Green Revolution” is doomed to failure.

Key words: Gaddafi; green revolution; *The Green Book*; Libya; ideology